

理论探索 LILUNTANSUO

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思想

俞良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就巩固和建设根据地展开了多方面实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其中内容之一是发展经济的思想。

一、关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

毛泽东就发展经济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下述重要的思想。第一，发展经济有利于克服经济困难和保证供给。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将发展经济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日程。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写道：“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也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另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1]（P142）同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从事生产，展开生产运动。同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在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中专门论及生产运动。他写道：“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部队机关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2]（P224）他特别强调，必须总结以往的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1942年12月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总结往年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同时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1944年底，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论及1945年的工作任务时写道：“1945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发展经济，保障自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2]（P240-24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上，根据地发展经济与克服困难、保证供给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发展经济有利于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由于严酷的抗日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经济上的封锁，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后连续几年遭受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1940年受灾面积达42万多亩，损失粮食2.3万石，受灾人口51万人；1942年，受灾面积85万亩，损失粮食7.9万石，受灾人口35万人。其中1940年的灾情特别严重，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时，群众啼饥号寒。边区政府为救济灾民，在机关、团体、学校开展节省一两米运动，并令各县政府组织赈灾委员会，选派得力干部深入灾区，调查情况，拨出粮款，赈济灾民。1942年底，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利益，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P224）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自己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向边区政府纳税，以供养军队和党政工作人员。针对有些党政工作人员主张增加税收，加大人民的负担，毛泽东批评说，这些人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竭泽而渔，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他提出：“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3]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人民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和改善生活，只知道向群众收取救国公粮，不知道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问题而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去解决公粮的问题，那就是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发展经济和满足人民利益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第三，通过发展经济可以使共产党人学习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是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各级领导干部都参与其中的大规模的运动。当时，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同时，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共产党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学习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除了消极的坏的一面以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决心自己动手解决供给的问题，“而其结果则是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还说：“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1]（P466）这里，毛泽东肯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而且阐述了学会经营经济事业的重要意义。

二、关于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推荐稿件

- 不平衡发展与中国新型城乡二元...
-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
- 马克思“改变世界”理想的公共...
- 我党提出“三个执政”的历史背...
- 在多元哲学景象中寻求确定性立场
- 提升信息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 毛泽东关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
-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马克...

相关稿件

-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1976-1978年中国引进...
- 对经典作家关于小农制历史地位...
- 《江泽民文选》的社会和谐思想...
- 论社会的网络结构
-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学校党的...
- 论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的同一性
- 浅论“资本生产力”--兼评一...
- 论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治理论的...

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政府很重视公营经济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公营工厂，先后恢复和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粉等工厂。到1944年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共有公营工厂101家，职工2.6万人。

毛泽东非常重视公营经济的发展。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分析说，根据地的全部公营事业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和商业，二是军队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三是党政机关经营的农业、工业和商业。他指出：“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1942年的计算及1943年的预算看，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P459）在上述文章中，他分析了党和政府重视公营经济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原因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批公营工商业，同时为了补助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曾发动机关学校种菜和养猪。由此，自己动手和自给自足成为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一个光荣传统。从现实原因看，从1938年开始，根据地军队的经费严重不足，不得不让一部分部队从事生产活动。1939年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恶化，国民党政府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学校机关也增多了，财政供给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1]（P460）毛泽东认为，从根据地公营经济发展的过程看，1938—1940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发展了农业，根据地政府则发展了工业。1941—1942年底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除一部分部队、机关和学校继续坚持发展农业以外，其他方面都发展了工业和手工业，也发展了商业。1943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1]（P462）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与根据地经济落后和生产水平低下实际是相适应的。1943年7月，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时再次提出：“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2]（P45-46）

毛泽东也很重视发展私营经济。在抗日根据地，私营经济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1939年有私营纺织厂6家，年产粗布3690匹。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余万斤。私营纸厂39户，还有私营皮坊10处，染坊3处，木匠铺13处，裁缝铺5处，银匠铺5处，铜匠铺5处，私人盐池多处。到1941年，私营纺织厂发展到30多家。商业方面，1936年延安有私营商店168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与1939年各增加了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达到262家。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毛泽东持支持的态度。1941年5月，他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要“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1]（P336）1943年7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2]（P46）在这里，他主张支持私人企业或民营生产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毛泽东主张在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合作社，其具体组织形式有“变工队”、“扎工队”等等。所谓“变工”，即换工，或者说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如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参加了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力或畜力，轮流给本队其他人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者补给工钱。“扎工队”主要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在陕甘宁边区，参加“变工队”、“扎工队”的劳动力达3万余人，占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毛泽东肯定了这种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形式。1943年，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3]（P931）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以来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不仅生产效率低，而且成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处于贫穷的境地。“克服这种状况的惟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惟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3]（P931）当然，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合作社，是以农民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合作社，而不是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当时他明确地说：“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3]（P931）他的这一思想也是同根据地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然而，他认识到即便是组织这样的合作社，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如果不进行这种变革，则不能使生产力有所发展。这就是他所说的：“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2]（P70）他还说，这种办法体现了生产制度的革命，将来可以推广到全国，在中国经济史上要大书特书。

三、关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当时毛泽东就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阐述了下述重要的思想。

第一，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根据这一制度，民主政权组成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人士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表明，共产党力求团结大多数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一起进行抗日战争。在实践中，毛泽东还就如何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和意见。1940年9月6日，他给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写信，就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问题发表意见。他提出，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大资产阶级是带有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压迫的、与外国资本联系少、主张抗日的阶级；同时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区别开来，后者是主张抗日并支持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人士[4]（P298）。同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关于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文件中提出：“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到钱。”“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1]（P320）1941年，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党内有的人在经济政策上思想过“左”，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实际上是主张不让地主吃饭并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他指出：“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列宁主义。”[1]（P342）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不给他们劳动和吃饭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逼着地主拿着武器同民主政权拼命，给富农分坏

田，必然使一部分富农降到贫农的地位，使一部分贫农也反对民主政权，“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以上论述足以证明，毛泽东主张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和路线。

第二，实行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依赖正确的财政货币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1938年8月，毛泽东在有关文章中就根据地的货币政策阐述了重要的思想。他提出：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需要的数量，可是应该估计到边区有扩大和缩小的可能；边区工业品主要来源于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需要[4]（P137）。由此认识出发，他提出以下建议：“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1]（P138）1941年8月6日，他在给有关同志的信中，就根据地的财经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边区的财经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平衡出入口。就发展经济而言，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等各行业的私人经济与公营经济。就平衡出入口而言，需要输出3000万元以上的产品于境外，交换3000万元的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平衡或争取一定量的出超。他提出，1941年边区政府以800万元投资公营事业，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对公营事业的投资，重视对私营经济投资，即发放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繁荣商业之目的。他说：“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20万至30万担粮食，则收20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

[1]（P366）他还说：“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30万驮出境，换取3000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3000万元之数。如能输出40万驮，除换取3000万元棉、布之外，尚有1000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1]（P367）

第三，加强经济管理。如前所述，根据地建立了公营企业。这些公营企业的正常生产和发展，依赖于有效和有利的管理工作。毛泽东就此阐述了重要的思想。1942年12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了企业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思想。其具体内容是：每一工厂应有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其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每一工厂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消除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现象；依照各厂的具体情况，有些可以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完成生产计划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1]（P463）当时，根据地的许多工厂存在着机关化的现象，如组织结构上非常不合理，管理人员众多，管理组织庞大，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根据地的小工厂上面。毛泽东对此提出：“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1]（P463）在根据地的企业内，分配领域基本上实行平均主义。毛泽东说：“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1]（P463）他认为，企业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则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在根据地的许多企业内，党的机关、行政机关和工会之间工作上不协调，不配合，各干各的事。毛泽东针对此说：“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节省成本，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1]（P463）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根据地的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这就是他所说的：“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1]（P370）他还说：“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1]（P465）当时，由于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采取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效仿，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搞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甚至不愿嫁给经济工作者，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毛泽东说：“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1]（P466）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第四，重视发展自然科学。在抗日根据地，党和民主政府非常重视发展自然科学。1939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开始了自然科学的研究。1940年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农业学校和农业试验场，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同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该研究会向其他根据地发出了推进自然科学研究的倡议。晋察冀边区响应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倡议，1942年夏在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灵寿县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该研究会下设工学会、农学会、医学会和电学会。1942年6月《自然科学界》在根据地创刊。毛泽东在当时的实践中就发展自然科学形成了重要的思想。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P269）这是对自然科学的作用和地位的正确说明。他说，资本主义旧制度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以要改变旧制度。“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1]（P270）他要求共产党人重视自然科学和研究自然科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作为革命者必须重视和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就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革命者。毛泽东还指出，根据地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科学技术，将改善人们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从而促进根据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俞良早（1951—），男，湖北汉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列宁与俄罗斯问题研究所所长。

